# 越国都城外城郊聚落遗址浙江绍兴发现一处

2021年11月至2026年4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越城区文物保护所联合对绍兴越城区G-8地块（南山遗址东区）进行为期四年半的考古发掘工作，揭露总面积为33800平方米。

浙江绍兴南山遗址位于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念亩头社区南山自然村，2020年10月因考古前置，经考古调查勘探发现，遗址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以坡塘路为界，将遗址分为东西两区，遗址堆积性质较为单一，以东周时期文化遗存为主，发掘区域内不完全揭露七处被古河道分割的黄土台地，发掘清理房址11处，灰坑2296个，灰沟327条，水井18口，另在台地边缘发现多处古河道护坡遗存。通过系统发掘，一处东周时期的临近越国都城的大型聚落面貌逐步被揭露出来。

绍兴南山聚落遗址的主要特征是土台与河道系统的组合，以河道作为台地之间的间隔和区分。水网多以正南北、东西向走势交错，最后与遗址东侧南北向的坡塘江连接，东西向河道宽度在10～20米之间，南北向河道宽度约为5米，与坡塘江构成聚落内外三级水网结构。结合浙江绍兴越国水利系统的考古调查成果，坡塘江上游发现的黄庙、云松和坡塘三级水坝系统与南山遗址年代吻合。而在遗址内部河道交汇处与台地边缘多见有成排木桩分布，包括河道走向的控制代表着遗址内的水资源管理措施。

遗址内的房址可分为两类：一为柱坑垫板式的大型建筑，以F11为例，其分布于多个探方中，以间距三米左右的大型柱坑为基础网格，呈现四排七列的分布格局，形成了面积约为200平方米的建筑。其柱坑以垫板和立柱的组合形成建筑支撑，各类垫板形态主要以窄木板双拼作为垫板，其下有横木加层。部分木板经加工处理，前端呈三角形，尾部呈两翼三角形。二是密集小木桩组成的房址结构，其以底部削尖的小木桩直接插入地下，密集成排，偶有大型柱洞中见有规格相对大的木桩作为中心支点，为典型的干栏式建筑格局。建筑用材中的大型圆木多见有牛鼻孔穿孔，应与水路运输木材有关，也是水网结构所带来的便利之一。

南山遗址的灰坑平面以椭圆和长条形为主，大小不一。大型灰坑的营建相对考究，方向为正南北或东西向，往往使用树皮铺底，以隔绝内外，更有甚者灰坑底部用木条做骨、编织物铺底，其中间再使用树皮铺垫，双层防护。其中H1685正南北向呈长条形分布，南北长8.2米、东西宽2.4米、深1.5米。坑内填土可分为五层，分层明显，其底部见有树皮铺垫层和部分木材。于灰坑中出土了大量原始瓷杯、碗及部分印纹硬陶片和夹砂红陶片，其余完整器物还见有陶罐、陶鼎、青铜削刀等。而H1863正东西向呈长条状，长6.7米，宽1.2米，深1.5米。灰坑可分为六层，其中四层为树皮铺垫层，可见清晰的层理结构；六层为编织物结构底部，有木条做筋骨支撑。出土大量印纹硬陶、原始瓷片，另见有青铜锄等青铜器以及动物骨骼、大植物遗存。

水井遗迹在遗址中规格较为统一，直径约为1～1.5米、深度为2米左右，从类型上分有竹编井和土井两类，竹井是在土井壁的基础上，用竹子和柳条等编织成圆筒形井圈。其中J8井口直径1.05米，井深2.15米，圆口直壁，填土呈浅灰褐色黏土，较疏松，出土黑皮灰陶罐等器物，井底铺垫有小鹅卵石以过滤水质。

经过初步整理，南山遗址出土遗物品种多样、数量众多，器型以原始瓷器、印纹硬陶、泥质陶、夹砂陶和青铜器为主，另有少量石器、木器等，且经过淘洗分选，收集到大量的植物种子遗存和动物骨骼遗存。

南山遗址出土青铜器数量较多，种类涵盖兵器、乐器、农具和生产生活用器，兵器有剑、矛、镞、镦；乐器有铎；农具有锸、锄、镰、铚；工具有斧、锛、凿等；生活用品有带钩、削刀、饰品、钵、锥、针等。此外还出土见有两件青铜越式小鼎，另有一定数量的戈形器。其中一件带钩背后见有人物和动物奔走的刻划图案，线条清晰，可分为上下两幅场景。根据对南山遗址出土的铅锡器物的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含砷铅块的铅料很可能来自浙东会稽山麓上虞银山等地，而锡含量高的两件锡铅合金原料应来自南岭地区。这为研究战国早期越国对本土铅矿的开发利用以及南岭地区与长江下游地区铅锡金属物料流通提供了新的材料。

原始瓷器，以素面为主，另有少量凹弦纹、瓦楞纹和S纹，器型有盅、碗、杯、钵、盘、碟、器盖、镇、匜、鉴、勾鑃、三足壶等。


印纹硬陶器物


原始瓷器物


戈形器


青铜鼎


青铜剑

陶器以印纹硬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另有少量夹砂红陶。印纹硬陶主纹饰主要有大方格纹、席纹、小方格纹、麻布纹、回字纹、⊠字纹、多重⊠字纹、大方格填线纹、菱形填线纹、米筛纹和方格纹的复合纹等，可辨器型有杯、坛、罐、钵、碗等；泥质灰陶以素面为主，少量见有戳印纹、部分外见黑皮，可辨器型有罐、盆、豆等；夹砂红陶以素面和绳纹为主，均为炊煮器，可辨器型有鼎、甑和支座等。

南山遗址出土的木制品可以分为建筑用材和木器两大类，建筑中又可细分为立柱、垫板；木器有短柄木桨、陀螺、案、箭镞等。

植物种子遗存，经过南山遗址地层遗迹中土壤的淘洗，浮选出大量植物遗存，主要有农作物、瓜果种子和杂草类植物，品种有炭化米、粟、冬瓜、桃、香榧、李、葫芦、猕猴桃、甜瓜、悬钩子、灯笼果属、筋骨草属、鳢肠、紫苏、红鳞扁莎、小藜和莓草。这些植物遗存对全面了解越国时期的生业经济和生产模式方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南山遗址是绍兴地区东周时期一处发掘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是越国都城外城郊聚落的典型代表。近年来，浙江绍兴地区发掘的越国时期遗址众多，南山遗址与大湖头、亭山、木栅桥、稽中、和畅坊、坝口等遗址一起勾勒出2500年前后绍兴地区的社会组织面貌，改变了以往越国文化研究中聚落遗址的工作相对较少的局面，共同构筑起越国时期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形态的考古学材料支撑。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越城区文物保护所 执笔：阮晓根 吴梦龙 高凌艳 徐新民）**

# 山西忻州尹村遗址2025年考古发掘收获

尹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旭来街街道尹村西北约50米的云中河北岸台地上，该遗址南临南云中河，北倚金银山。东南邻近尹村居民区，西北侧临近胡家垴流经岩口注入云中河的季节河。该遗址是忻州地区重要的龙山至夏商时期遗址之一，对研究先商文化起源有着重要意义。

2025年考古发掘是2021年至2024年发掘工作的收尾，目标明确。目标之一为找到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的过渡时期的标准地层或标准单位，以填补在遗址分期过程中这一时期地层叠压关系少的缺陷，实证先商文化与晋中类型的关系；目标之二为寻找环壕门塾，进一步认识环壕的时代、形制和功能。

## 主要收获

2025年3月中旬，对在2024年3月通过重点勘探所找2023XYⅢG3的北门道区域再次进行系统勘探。勘探所选区域东西长55米，南北长45米，总勘探面积为2475平方米，经勘探发现该地点灰坑密集，踏查时采集陶片数量较多、保存较好，时代基本确定为龙山晚期至夏代，适合作为夏文化发掘的一处重要地点。

本次发掘共布5米×5米南北向探方14个。探方按环壕、灰坑、砖室墓等遗迹的分布范围布设，对探方内遗迹现象划线航拍；之后按照每层0.2米分层发掘遗迹现象，发掘完成后进行平剖面图绘制最后提取文物。比较重要的灰坑按照1/2发掘法发掘，清理完遗迹内灰土后，打扫干净并数码照相，将文件归档。出土文物先进行拍照画图，之后按照由上至下的顺序小心提取、采集。在发掘探方内地层或是遗迹时，将发掘后灰土进一步过筛，并按照探方以及地层、遗迹分别采集，清理遗物表面杂土后装袋，并标明单位。

发掘区内现状地形平坦，平均发掘深度3.3米，发掘区内地层堆积较为简单，大致分为四层；依据土质、土色、包含物，①②③层分布于整个发掘区，其④层分布于发掘区南部，呈南高北低的走势堆积。其①层为耕土层，土色灰黄，土质较松散，厚15～25厘米，包含有大量植物根茎、少量碎石块和现代废弃物；②层为扰土层，淡黄土，土质松软，厚10～15厘米，包含少量碎石块；③层为文化层，土色泛黑灰，土质偏硬，厚35～45厘米，包含少量碎石块、陶片等；④层为文化层，依据土质、土色、包含物及堆积范围可分为④a层和④b层，其中④a层土色呈黄褐色，土质偏硬，厚75～85厘米，包含少量碎石、动物骨骼、陶片；④b层主要分布于探方T0301、T0302、T0401、T0402内，土色泛黑灰，土质偏松软，厚45～55厘米，包含少量碎石块、陶片等。

共发掘各类遗迹22处。其中墓葬2座、墓道3条、灰坑14处、取土坑1处、陶窑1座、环壕1段。

从探方内地层及各类遗迹内采集各类小件器物共104件。其中陶器32件，骨器26件，石器46件。墓葬内出土器物共57件，其中陶器31件，瓷器3件，铁器4件，铜器2件，铜钱7枚，铜纽扣3颗，玻璃器1件，石器6件。

Y1位于发掘区中南部，开口于④层下，保存状况较差，由窑室、火膛及窑前工作面组成，方向23度。该窑室平面基本呈圆形，窑壁呈袋状。窑箅东南西北有相对应的四处火道，为竖向圆形，火道口部为三角、四角放射状和椭圆状三种，窑底中部已塌陷，各火道下均有火眼一处，表面均为青灰色。窑室底径1.74米、残口径1.44米、残高0.48～0.7米，火道口径0.12～0.22米，个别火道内填充有不规则青烧土块。窑前工作面北部被H2南壁打破，平面近长条形，自西向东呈西低东高，斜壁内收，较粗糙，加工痕迹不明显。工作面大部平整，未发现制陶工具及泥料。


2025XYG1第⑤层出土鋬手鬲

G1自西北—东南向贯穿于整个发掘区中部，开口于④层下，发掘部分长43.5米，上口宽4.6～5.5米，深3.1～4.4米。该环壕口大底小，其西段被M2后室打破，中段被H2、M2南侧双耳室打破，东段被M1、H2、H3、H5、H9、H14打破，其南北壁略倾斜内收，北壁直立，南壁斜缓，壁面粗糙，无明显加工痕迹。南壁自西向东开口下0.7米处有生土台，宽0.3～0.9米，G1底部呈西高东低缓冲状。通过对剖面的地层堆积进行研究划分，G1自上而下可分为6层堆积。G1出土陶片及小件数量较少，陶片多集中于⑤层、⑥层，其中泥质陶多于夹砂陶，纹饰主要有中宽、宽篮纹，素面，细、中粗、粗绳纹；可辨器型主要有侧装鋬手鬲、罐、甗、钵等。根据其形制及底部特征，推测该环壕使用时期最早可至龙山晚期，并于夏代晚期废弃，主要用途为防御和排水。

H9位于发掘区中东部，西邻H2，东南邻H3、H5，开口于③层下，北部被M2墓道中段南壁打破，现仅存部分约三分之一。坑壁整体呈袋状，壁面较平整，且未发现明显加工痕迹。坑东壁有壁龛，呈方形，壁龛顶部有塌陷，整体近直壁，平顶、平底，其宽0.6米，最高0.7米，进深0.68米。坑西南近底部有呈锥形的烟道，其壁近底部受火烧影响呈红色，底部有较硬烧结面，泛红褐色。由于其北部被M2打破，据残存部分推测其原本整体平面形状近圆形。坑内出土陶片较少，纹饰主要有交错中粗绳纹、蛇纹、竖向中粗绳纹、素面、附加泥条、弦断中粗绳纹，可辨器型主要有鬲、罐、罍、盆、甗、瓮、钵，其中夹砂陶片多于泥质陶片。根据该坑形制及其内壁特征，并由于其与Y1距离较近，故推断其用途可能为阴干陶器的场所或做房址用。

M2开口于②层下，开口距现地表0.32～0.45米，呈东西向，由墓道、墓室、耳室组成，墓道位于墓室东端，呈长条形，该墓打破③层（文化层），方向东偏北104度，墓道长约18.3米，宽1.96米，墓道壁及底部较平整，斜坡墓道，最深处约3.84米，有踩踏硬面。墓道由西向东依次被M3、M4打破北壁，被K1、M5打破南壁；墓道底部近墓门封门前有“人”字形交错平铺的条形砖作为铺底砖，其宽1.36米，长1米。该墓前后室遭破坏严重，其残长7.22米，残宽3.4米，仅存残断墙体及转角部分，砖室内有大量砖缺失，推测被后期人为拆毁。前室西北端出土红色彩绘陶盘一件，保存情况一般。铺底砖东部底面有近似不完整的长条状黑色印痕，呈东西向，推测该后室置棺三具，破坏程度极其严重，棺、人骨、随葬品残片所剩无几，后室甬道近底部填土内出土部分陶灶、陶魁、陶瓮残片和一枚“五铢”铜钱，后室口处出土彩绘陶盘、彩绘陶盆残片。


2025XYG1环壕发掘完毕


2025XYY1窑室清理完毕（俯视）

两侧耳室顶部结构均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呈弧边、弧壁，其铺底砖先顺向错缝平砌四层条形砖，之上竖向丁砖一层，此类组合共三组，之上再顺向错缝平砌条形砖至顶。南侧双耳室其整体墓壁面垂直、粗糙，局部显露明显工具痕迹，类似铁镢，东、南壁均发现打破早期灰坑。南侧双耳室西耳室长1.78米，宽1.76米，高2.8米，甬道进深0.72米，甬道拱券顶与前室连接处遭到破坏，其顶部保存较为完整，未遭明显破坏。出土随葬品有长条形铜刀残段、泥质灰陶灯一件、陶灶一件，均残，保存情况较差。

M2整体经盗扰破坏严重，出土随葬遗物数量较少，根据其形制及出土遗物推测为曹魏至西晋时期的砖室墓，由于其整体规模较大，打破灰坑较多，其填土内有灰坑原有的小件与陶片。

## 发掘意义

第一，环壕的存在是肯定的；环壕的时代应该始建于龙山中期偏晚，也就是杏花遗址的第四期第三段H9，只是鬲裆部的细节显示尹村遗址G1⑥的更晚一些；与忻州游邀遗址的中期H291的正装鋬手鬲相比，尹村大概与它同时。

第二，环壕的位置和时代的确定对研究忻定盆地龙山晚期至夏代文化的变迁和人群的迁徙以及杏花文化在忻定盆地的扩张、消亡等均有显著的意义。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忻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执笔：王俊 郭银堂 崔宁）**

# 山东淄博小高后李文化遗址考古勘探收获及相关认识

后李文化是海岱地区新石器中期年代最早的考古学文化，距今9000～7300年。与东亚大陆其他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类似，后李文化生业经济以渔猎采集为主，但随时间由早及晚农业比重逐步提升。目前已发现后李文化遗址十余处，主要分布于鲁北泰沂山前地带。

小高遗址位于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小高村东北，是一处以后李文化早期阶段遗存为主的遗址。2023年12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小高遗址进行了调查勘探，基本摸清了小高遗址分布范围，并发现小高及邻近的彭家后李文化时期聚落均位于孝妇河支津古河道凸岸的高台地上，周围间错水汊与沼泽，向水而居倾向明显。

## 既往考古工作

1987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于小高村东北采集到商周时期夹砂灰陶粗绳纹鬲、泥质灰陶簋和战汉时期泥质灰陶罐残片等，并以此为依据对小高遗址进行了首次登记。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于遗址西侧断崖处采集到陶豆、铁鎛、板瓦等战国至汉代文物标本。2014年3月，小高遗址被淄博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7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山东大学对小高遗址进行发掘，清理面积795平方米，所见遗存面貌以后李文化早中期为主，特别是集中发现了10余座后李文化房址，从而确认小高遗址是一处后李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

彭家遗址隔华光路、滨莱高速与小高遗址南北相望，二者为同一地貌单元。2000年滨莱高速建设期间，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彭家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区位于小高遗址西北300米处，揭露面积500平方米，遗迹以后李文化时期房屋、灰坑为主。

## 勘探过程

2023年12月，为配合淄博市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小高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旨在厘清小高遗址分布范围、文化内涵、年代等基本情况。

遗址周边环境较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时已发生明显改变。据村民介绍，2000年，滨莱高速公路建设时曾在施工区域两侧取土，形成南北向取土沟，亦即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发现的“断崖”。2016年至2018年，华光路西延工程建设期间，取土沟及临近区域被用作弃土场，形成大面积的渣土堆，后经车辆压实，目前已无法进行勘探。

结合过往考古工作，我们将位于渣土西南侧的小高遗址文物保护范围定为初步勘探区域，以10米为间距布设“米”字形探孔，勘探深度以到晚更新世黄土层为止，遇到料姜石则在相邻区域重新布孔。

根据土色、土质及包含物不同，我们将小高遗址地层堆积分为五层，从上至下、由晚及早依次为：①层：厚0.3～0.5米，表土层，浅灰褐色，土质疏松，含有植物根系及现代垃圾；②层：厚0.4～2.4米，黄褐色，略黏；③层：厚0.15～0.3米，灰褐色，较疏松，含分布不均匀的烧土颗粒、草木灰灰烬和极为破碎的“自然土陶”陶片；④层：厚1.5～2.0米，黄褐色，较致密，混杂灰土块；⑤层：黑褐黏土，较致密，纯净，是较湿润时期发育的古土壤层。⑤层下为黄土堆积，土质疏松，未进行详细勘探。

此次勘探主要发现③④后李文化地层，于地表采集和个别探孔带出后李时期陶片。未探出其他时期遗迹，但于遗址地表及周围采集有战汉时期泥质灰陶片、筒板瓦片以及唐宋时期瓷碗（残）等遗物，结合2000年、2017年对彭家和小高遗址的发掘情况来看，此类晚期标本应出自附近彭家遗址。

为进一步确认聚落结构，于遗址中部向东延伸了一排探孔。在遗址东侧60～70米处发现古河道，河槽横断面为近似对称抛物线形，宽40～50米，深2.6～3.5米，较孝妇河现有河道偏窄。为摸清古河道走向，继续向南、北两个方向分别布设探孔，确认遗址位于河流凸岸，2017年发掘区濒临古河道，古河道从南、东、北三面半包围遗址。

遗址西侧为滨莱高速。河流冲积物既是制陶原料，又是砖窑厂生产用黏土来源。滨莱高速以西因砖窑厂取土曾整体凹陷2.5米左右，后用煤渣土垫平。我们对这部分区域进行了试探，确认渣土层下为生土，未见文化堆积。

## 相关认识

**地层成因** 2013年之前，遗址所在区域长期作为耕地使用。受耕作活动的持续性扰动，土壤表层的原始自然状态已完全消失。按《张店区志》所记，小高村地处砂姜黑土分布区域。依据土壤发生学理论，砂姜黑土的成土母质为河湖相沉积物，其发育过程与脱沼泽作用存在密切的成因关联。

小高遗址②～④层均受河水冲积形成。其中，③层包含较多的红烧土颗粒和极为破碎的“自然土陶”陶片，陶片为红褐色，质地疏松，夹石英、长石或蚌壳粉屑，符合后李文化时期制陶技术特征。

小高遗址古土壤层起伏较大，整体呈中间高四周低格局。遗址位于古河道凸岸。一般来说，凸岸受流水侵蚀的强度低于凹岸，河岸稳定性较好。小高遗址位于孝妇河下游，地势平坦，河流水动力条件较弱，自然状态下侵蚀方式以侧向侵蚀占主导，河床易受泥沙加积作用持续淤高，从而导致决口与河流改道事件。古河道向北进入彭家遗址，彭家遗址地下普遍分布有淤土层，后李文化时期该区域应为湿地景观。

基于现有材料分析，全新世早期，鲁北地区气候转向湿润，在第四纪黄土基底上发育形成古土壤层。孝妇河此时流经今小高村一带，受流水作用影响，河流两岸逐渐形成泛滥平原与湖沼地貌，吸引早期人群至此定居。该河流在不晚于汉代时发生改道，叠加汉以后长期人工耕作活动的改造，最后形成小高遗址现今地层序列。

**区位环境比较** 从考古学文化区的尺度来看，后李文化主要分布在泰沂山地与黄河冲积平原的过渡地带，动植物种类丰富，与新石器早期的广谱经济模式相对应。从遗址尺度来看，这些遗址大多位于黄河、小清河的一、二级支流沿岸，河水堆积物兼具肥力与排水性，满足原始农业的基本要求，适宜后李文化先民生产生活。

我们以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提供的GDEMV2数字高程模型为基础数据源，利用QGIS软件对河流中心线以100米等间距进行高程采样，采用邻近点加权法对各采样点进行前后3个数据的加权平滑处理，计算得出遗址邻近河道上下游3千米范围内的平均纵比降一般介于2.5‰～4.3‰。

这一区间下的水动力条件复杂，侵蚀与沉积作用均表现出较强的活跃度。各河流上游为泰沂山前黄土带，水土流失较为严重，多年平均悬移质含沙量为1.5～2.0千克/立方米。受洪水期与枯水期水文情势交替改变的影响，河流系统在年内时间尺度上存在加积与下切作用的交替，年际尺度上以下切为主。对西河、后李遗址的地貌学调查表明，由于河床下切，后李文化时期这两个遗址地貌环境经历了由河漫滩向河流阶地的转变。

山区径流携带大量泥沙汇入山前平原后，因河道展宽、地势趋缓导致流速骤减，河流以侧向侵蚀与垂向加积作用为主，泥沙堆积，河曲发育。小高—彭家遗址位于孝妇河房镇段，地貌类型为山前平原，该段河道纵比降只有0.7‰。遗址中埋藏的古河道沉积物以中细砂为主，粒径较小，表明全新世以来此处以接受河流冲积作用为主。

**文化适应** 孝妇河流域基本叠置于淄博向斜之上，其东、西边界分别为铁山山脊与长白山脉山脊。后李文化聚落的活动范围不太可能突破流域分水岭的限制。孝妇河下游地势开阔，流域东西跨度逾30千米，目前只在小高—彭家遗址附近发现后李文化时期文化遗存，表明这一区域整体资源开发强度并不大。

山东大学孙泽娟、高瑶分别在其学位论文中讨论了小高遗址出土植物、动物遗存情况。小高遗址先民对动物的狩猎活动避开了夏季，出土植物的果期多分布在夏末至深秋。

探讨早期文化的定居程度时，需充分考量遗址所处的微地貌环境对先民生产生活的制约作用。小高遗址坐落于河漫滩湿地，该区域虽能为先民提供其他地貌单元难以比拟的动植物、土壤肥力以及水资源，但汛期遭受洪水侵袭的风险较高，并不具备长期定居所需的安全条件。从聚落安全的角度出发，后李文化先民应尽可能规避洪水灾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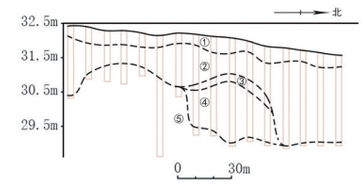
小高遗址2017年发掘的部分遗迹单位中出土蚌的尺寸宽度集中在20～35毫米之间，仍处在生长期中，表明该地渔猎采集强度曾经到达过很高的水平。考虑到此时孝妇河流域整体开发强度不是很高，我们认为，小高遗址周边可利用资源优于流域内其他区域，先民在每年夏末来此进行渔猎和采集，并生活到第二年汛期来临。

## 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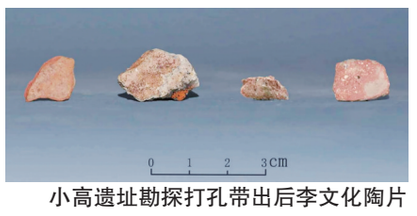
考古工作表明，小高遗址是一处以后李文化时期文化遗存为主的古遗址，第二、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采集到的历史时期文化文物标本很可能来自遗址北侧区域。全新世早期，古孝妇河水系中的一支开始流经今小高村，小高遗址与彭家遗址的后李文化聚落分布于该河流河漫滩上。

气候变化是后李文化时期遗址自然环境改变的动因，不同区位的聚落受到的影响不同。分布于山前平原前缘或山间平原的聚落，河道纵比降较高，河水流速快，河床容易下切形成河流阶地，对聚落延续影响较小。小高遗址位于山前平原中部，河床纵比降低，河水流速较慢，河曲发育，易受洪水影响，不具备早期聚落长期存续的稳定环境。小高遗址后李文化聚落定居程度不高。该聚落存在一定时间，并在每年的汛期暂时移居他处，这些是后李文化先民针对河漫滩湿地的自然地理特点形成的针对性适应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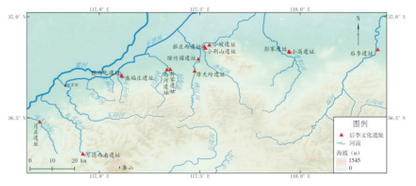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联2025年度人文社会科学课题“淄博小高遗址勘探资料整理与环境考古研究”阶段性成果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执笔：赵荣鑫 王子孟］**



小高遗址勘探地层剖面图（自南向北）



小高遗址勘探打孔带出后李文化陶片



鲁北地区泰沂山系山前地带后李文化遗址分布位置示意图